

# 星云大师三到长安

石炎岭



▲2003年2月13日,时任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团长王长安,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向星云大师赠送西安碑林博物馆黄庭坚书法拓片。 石炎岭 摄



▲2003年2月13日,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应邀访问佛光山时,本文作者石炎岭与星云大师合影留念。

2月5日下午,台湾佛光山开山长老星云大师在台湾圆寂,享年97岁。星云大师与西安有缘,他生前三次到西安,本文作者三次采访、晤谈,大师的平民风范、慈悲心肠和宽广胸襟,令人难忘!

## 初到西安,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星云大师多年的夙愿。

1988年4月1日至4日,星云大师率领的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大陆探亲弘法团一行72人,对西安进行了访问。星云大师是江苏扬州人,是国际著名的佛教大师、台湾备受尊敬的佛教领袖。他在台湾高雄开创佛光山寺和佛光山佛教事业集团,拥有信众百万。

4月3日,星云大师一行拜谒了佛教圣地——扶风法门寺,受到数百僧众和游客的夹道欢迎。大师产生了恭请佛指舍利赴台湾供奉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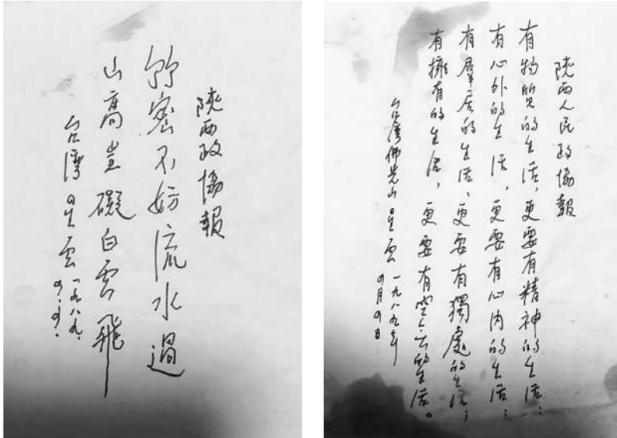
在西安期间,星云大师一行拜谒了兴教寺、大慈恩寺和大雁塔等著名佛教圣地,还游览了兵马俑、华清池、半坡博物馆、西安古城墙、乾陵、碑林、马嵬坡等历史名胜。所到之处,背诵诗词,谈说文篇,发思古之幽情,祈祷诸佛保佑众生,极富情趣。

大师接受笔者(时任《陕西政协报》要闻记者)采访时说,西安一直是他梦中的精神故乡,中国最强大的王朝周、秦、汉、唐,都曾建都于此。他说:“我从小熟读唐诗,唐朝诗人咏诵长安的万首诗句,耳熟能详。我对昔日的长安充满向往!”大师说,此次来陕西了却了他的一大心愿。

据随行的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介绍,星云大师一行在北京期间,受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热情接待。西安是星云大师此次重返大陆探亲弘法的第二站。4月下旬,大师将去故乡扬州探望分别近40年、已届九旬高龄的母亲。

4月4日下午,星云大师一行乘飞机离开西安赴敦煌。出行前一天上午,星云大师应我的请求,在下榻的西安宾馆,挥笔写下80余字的题词。大师的随行人员表示,大师写这么多字的题词,不多见,显示了大师在西安的愉悦心情。

其中一题词是: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另一题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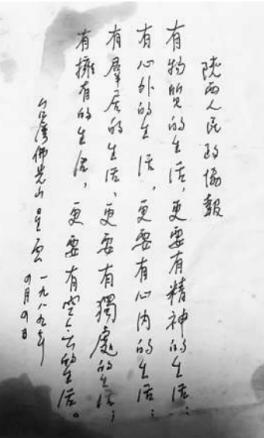


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精神的生活;有心外的生活,更要有心内的生活;有群居的生活,更要有独处的生活;有拥有的生活,更要有虚无的生活。星云大师率领的弘法探亲团共204人,在北京访问后,分为6个团,到各地探亲。这是台湾当局自1987年11月开放探亲5个月以来,应邀来大陆探亲访问的最大访问团。

## 再次来陕,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瞻仰供奉

2002年初,应星云大师和台湾佛教界的请求,中央政府特别批准,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供奉37天。2月22日,星云大师担任主任委员的台湾佛教界恭迎委员会,来陕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瞻礼供奉。

当天下午,中国佛教协会在扶风县法门寺隆重举行佛指舍利赴台供奉启程法会,专程前来大陆迎请佛指舍利的台湾佛教界300余人和大陆佛教界及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法会。傍晚时分,恭迎团回到住地酒店。



我和夫人赶到酒店大师住处时,大师正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孟西安的采访,他示意暂停采访先接待我们。我说,难得大师还能记得我一个小记者。大师说,报纸无大小,每个记者都应该得到尊重。亲切的话语,令人倍感温馨。随后我们互致问候,大师与我和夫人合影留念。临别时,大师赠送我们一幅金箔观音像。

## 三到西安,恭送佛指舍利回归法门寺

2002年3月31日中午时分,从台

# 我的父亲吉鸿昌烈士

吉瑞芝 口述 本报记者 张原 采访整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吉鸿昌烈士的女儿吉瑞芝,因病于2023年1月12日8时17分在天津总医院逝世,享年91岁。

吉瑞芝生前,记者有幸采访了她,听她讲述吉鸿昌烈士和她一家的故事。

1949年天津解放后,党组织找到母亲和我,他们一见母亲就亲切地说:“吉夫人你受苦了,你是吉鸿昌烈士的夫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授予吉鸿昌同志革命烈士的称号,今后你们的生活有组织安排。”

我进中学读书后,在学校的团组织帮助下,思想上有了进步,成为学校的第一批共青团员。1950年,开展“镇反”运动,天津市召开了万人大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为我的父亲吉鸿昌烈士报仇》。会后,亲手策划谋杀吉鸿昌的凶手吕一民被正法。

1951年,我和母亲一起应河南省党政领导之邀返回故里,为父亲扫墓;随后,我们母女俩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河

南省人代会。1953年,党和国家为了褒奖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颁发了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我母亲胡红霞签发的《光荣烈属纪念证》。1954年,我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和工作,并于195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吉鸿昌烈士牺牲30周年,河南省委、省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将吉鸿昌的棺柩由扶沟县迁往郑州市烈士陵园。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牺牲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写进书。”此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吉鸿昌的事迹以小说、话剧、电影及书刊等多种形式广为流传。197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吉鸿昌》获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

为了再现吉鸿昌光荣的一生,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带病和摄制组的同志们一起奔赴北京、河南、东北、河北等地。电影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特别是吉鸿昌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口死不倒下的英雄气概和那首充满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多观众写信给我,表达他们对民族英雄无限崇敬的心情,使我深受感动。

1984年11月,在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的日子里,河南省委在郑州市和扶沟县分别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为纪念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国魂——吉鸿昌将军牺牲50周年纪念辑》,邓小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聂荣臻同志题词,赞誉吉鸿昌为“民族英雄”。

此后的几年里,我广泛地收集资料,完成了一部39万字的《华夏忠魂——吉鸿昌传记》,是至今为止收集吉鸿昌史料最全的一部传记,已于1991年12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了使吉鸿昌当年在家乡办起的“鸿昌学校”办得更好,多年来我倾注了大量心血,努力帮助家乡逐步恢复学校面貌,成为从小学到高中的完全中学。经过多方共同努力,1984年,“鸿昌学校”高中部成立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我荣幸地成为该校的名誉校长。这是最值得我欣慰的。

1995年,我参加了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成为第一批宣讲团的成员。这些年来每年为学生会的报告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宣讲几十次约十几万人,接待来访的师生无法统计。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不便,

湾返回的、搭载着佛指舍利的专机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在机场候机室,星云大师接受了我的简短采访。他说,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台瞻礼供奉,先后在台北、高雄等地接受民众顶礼膜拜。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们涌上街头,跪拜迎接。全台湾500多万人,对佛指舍利行跪拜大礼,许多民众激动得失声哭泣。星云大师特别介绍说,今天(3月31日)早晨,在佛指舍利即将回归法门寺之时,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中华民族佛教徒会聚佛光山,已经跪拜了一天一夜的30万人,依依不舍地恭送佛指舍利登上专机。

随后,星云大师请秘书交给我一份100多页的剪报复印件,集中了台湾各大媒体对佛指舍利在台供奉盛况的报道。这批复复印件制作专业规范,我感叹佛光山人才济济。

当时未曾想,仅仅相隔不到一年后,就和大师又见面了。2003年春节前,我在《各界导报》(原《陕西政协报》)副总编辑的笔,策划组织了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去台湾访问。事先联系时,星云大师秘书转告,大师欢迎我们一行来佛光山参观,他要会见我们,还要设宴款待,希望我们在佛光山住一夜,感受人间佛教的魅力。

2月13日,星云大师在佛光山会见了我们代表团一行。大师对大家嘘寒问暖、极为亲切,会见气氛欢快温暖,不时传出欢声笑语。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王长安团长,向星云大师赠送了西安碑林拓片。大师说,他喜欢这幅拓片。

会见后,星云大师设宴款待我们这些西安客人。大师让寺院专职摄影的大和尚陪同我们参拜佛光山寺院。片刻,我们在大草坪散步,合影留念放大加塑,每人一份,送到我们手中。当晚代表团一行宿营佛光山寺庙宾馆,听暮鼓晨钟,闻佛经吟诵,真是难得又难忘的人生经历。

(作者系陕西省政协原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我把爱国主义教育阵地搬到了家里,家中最大的一个房间改成了陈列室,吉鸿昌烈士的遗物遵照遗墨都摆放在这里。来访的青年学生们反映既真实又亲切。

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从4月5日至8月16日,我应邀为学校、团体、机关、农村和部队讲演20余场,听众3万余人。几十年来,我不仅宣讲,还撰写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书,捐赠给各个学校。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和母亲先后向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烈士陵园吉鸿昌烈士纪念馆、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念馆等单位捐赠了吉鸿昌相关遗物,特别是在狱中所写的遗嘱和相关资料,这些珍贵文物都是我和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许多同志看到后不仅为吉鸿昌光辉的一生而震撼,同时也对于我们在那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还能把吉鸿昌的遗物遵照保存得完好无缺表示钦佩。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适逢吉鸿昌诞辰110周年,天津市委党史办出版《民族英雄吉鸿昌纪念辑》,我把珍藏的80多张照片捐赠给天津党史办。天津市领导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7年在庆祝建军80周年举行的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上,我作为模范烈士代表,参加大会并受到表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09年10月我作为“双百”英雄的后代,荣幸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活动。

2009年11月24日,为纪念吉鸿昌牺牲75周年,河南省在他的家乡扶沟县重新修建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2015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闻一多治印

张雨

1938年2月18日,闻一多为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鼓励学生说:“中国,不是法西斯,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然后,他便与200多名师生徒步行程3000余里,历时68天,随学校迁至昆明,之后在新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大继续任教。

随着抗战的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大名鼎鼎的教授过着贫穷的生活。据说,当时昆明的乞丐都不找他们要钱,大家都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闻一多要钱,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扭头就走:“你早说嘛,害得我白看了你半天!”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由此可知,大教授们穷得叮当乱响。

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人,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买来下锅,闻一多把自己穿的一件心爱的皮大衣送进当铺,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

图书馆。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有的教授提醒他去治印。因为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治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闻一多思考再三,决定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战斗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酬金,他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还。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闻一多却分文不取。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可见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闻一多的印作大多收入《闻一多印选》。闻一多的印刀法刚健,疏密有致,有笔有墨,给人以雍容、古朴的美的享受。冯友兰、朱自清、吴晗、华罗庚等都保存有闻一多为他们刻的印,一直视为珍宝。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赵元任的文字游戏

刘兴尧

1959年,胡适邀请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到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学,赵元任欣然应允。赵元任总共讲了16讲,内容非常丰富,牵涉到语言学的方方面面,听众中也有有心人,知道赵元任是语言大师,来讲课的机会难得,于是就在他讲课内容全部录音并加以整理,出了一本书,书名叫《语言学问题》,这本书现在仍是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在台湾家喻户晓。

一次讲课前,赵元任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语言学跟语言学有关的些问题》,“些问题”好解释,就是一些问题,少写了一个“一”。“跟跟”就不好解释了,而且从句子看也不通,很多人都认为他多写了一个“跟”。

讲完课后,有台湾的记者对他做了采访,认为他多写了一个“跟”,

赵元任解释,第一个“跟”是连词,第二个“跟”是介词,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语文学和跟语文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但是记者仍然觉得重复了,太啰唆,于是他第二天写报道的时候,还是少写了一个“跟”,成了《语言学跟语言学有关的问题》,赵元任看到报纸后,也没生气,就说:“不对了,少写了一个‘跟’。”

其实,这是赵元任的文字游戏,也是他幽默可爱的表现,他明明可以不这样写,但是他偏偏这样写,这样写也许可以给听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吧。

作为语言学家,赵元任用他独特的方式,让大家对语言学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从而喜欢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家,文字游戏也是促进人们学语言的一种方式吧。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陈忠实的灵感

崔鹤同

1987年春节刚过,为一部长篇小说搜集素材,陈忠实到蓝田县城去查阅县志。

当他查阅到《贞妇烈女》三卷时,头一本上记载着有名有姓的贞妇烈女们贞节守志的典型事例,内容大同小异,事例重复,文字也难免重复。列在头一名的贞妇最典型的事例也不过七八行文字,随之从卷首到卷末逐渐递减到一人只有一行文字。第二本和第三本已经简化到没有一词一句的事迹介绍,只记着张王氏、李赵氏、陈刘氏的代号了,属于哪个村庄也无从查考。整整两大本都这样,没有标点,更不分章节。看这些连真实姓名也没有的代号干什么?

当陈忠实毫不犹豫地把这三本县志推开的一瞬,心头悸动了一下。他突然替那些无以计数的代号委屈起来。她们用自己活泼泼的躯体、美好的生命,坚守着一个“贞”字,终其一生而在县志上争取到三厘米的位置,却没有谁人有耐心读她

们的名字,这是几重悲哀?他重新把那三大本搬到眼下翻开,一页一页揭过去,一行接着一行、一个代号接着一个代号读下去,像是排队在点名。那些干枯的代号全都被他点化为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在他的房间里舞蹈……他庄严地念着她们的名字,仿佛向她们行注目礼。

他无限感慨,又无言以对。合上那三本《贞妇烈女》卷县志,屋子里的幽灵也全部寂然,他深切地感到了什么叫历史的尘埃,又是怎样沉重的一种尘埃啊!

陈忠实任乡村工作的20年里听到过许多男女故事,这种民间文学的脚本通常被叫作“酸黄菜”。正是那三本《贞妇烈女》卷里的人物,和“酸黄菜”里的故事,突然像电击火进一样,使他产生了一种欲罢不能的艺术灵感,眼前瞬间幻化出一个女人来,就是后来写成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淳朴、善良、堕落、无助、无辜的女性田小娥。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高晓声拍摄《农民陈奂生》

周星

1997年5月,江苏电视台台长苏子龙请高晓声吃饭,想把陈奂生系列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席间,苏子龙提议让陈奂生走上电视荧屏,高晓声欣然表示同意,说道英雄所见略同。他感慨道:难得一部小说发表了十七八年,还有人记得,令人感动。但是他有个要求,就是电视剧必须要忠实于原著,否则不如不改。他特别强调电视剧的风格不能改,一定要是正剧,不能搞成喜剧或者滑稽戏。他还建议要把陈奂生系列作品都搬上电视荧幕,剧名可叫作《农民陈奂生》。

担任制片人的是江苏电视台影视部副主任刘旭东,他对高晓声承诺一定充分尊重原著,但由于原小说是系列小说,要改成连续剧,在结构和情节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还请高老谅解。高晓声爽快地拍板,并当场推荐常州作家石花雨担任编剧。

石花雨改编剧本花了很大力气,上百万文字,四易其稿,但高

晓声几乎不干涉他改编的过程和结果。只在一些细节上,高晓声是每稿必看,逐字推敲。他作了多处眉批,提出意见,有些地方与编剧反复讨论商定后修改。为了使剧情更集中、精练,电视剧最终由12集压缩到8集。

高晓声不但在剧本分集大纲上指点方向,而且还专门为电视剧写了几首插曲。但他自己觉得不满意,感觉有点拿不出手,就请石花雨重写。石花雨也写了四首,其中分粮时激动人心的插曲,就用了“今年秋天不寻常”为题,再加上宋祖英动人的演唱,让许多有过相似经历的观众都落泪了。

编剧石花雨后来回忆道:“高晓声对此剧倾注了全部心血,几乎每一稿上都有他的亲笔批注,包括我为该剧写的四首歌词,他也都提笔作了修改。”制片人刘旭东也说:“高晓声对陈奂生的语言,给予了非常多精彩的润色。他所改之处,让人感受到他对农民的熟悉和了解,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程度。”